

鄂北第五战区抗战文艺活动概略

吴永平

鄂北——此文中主要指的是均县、老河口、襄阳、樊城、随县、枣阳、宜城一带。抗战时期为五战区辖区，长官司令部及所属政治军事领导机关经常活动的区域。这里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锣鼓歌声口号标语曾覆盖过这片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支“笔部队”，他们在战壕里面和将军们聊天，在火线上向战士们采访，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满怀的激情织成锦绣文章，撒向前线、大后方和沦陷区，他们的声音甚至传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引起同情和钦敬的回波。

抗战文化工作是战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曾有力地影响着战区军民的抗战热情，呼应和鼓舞着战区的工作进程，影响所及鄂豫皖广袤的战地。《新华日报》曾多次报导此地的抗战文艺工作；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周恩来的介绍和推荐下专程来此地采访，盛赞其为“文化战区”、“模范战区”；而大后方及四围沦陷区的热血青年纷纷赶来请缨抗战，一度聚集流亡青年数千人之多。

鄂北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基本政策的结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凝注着各阶层各民族抗日救亡的呼声和献身精神，其中发挥中坚和骨干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从抗战初期张勃川同志领导的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臧克家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团、钱俊瑞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李相符同志领导的抗敌工作委员会，到抗战中期克家、雪垠、田涛、碧野、孙陵为骨干的中华文协第五战区分会，直至抗战中后期张维发起的艺术家协会，都是如此。

战区文化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简言之，就是要比其它地区更加直接地反映战区、前线、官兵的生活和要求，在这里，没有“与抗战无关论”论者存在的余地；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里的进步文化人的生存环境更多地取决于地方长官的个人意志与好恶，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的文化人的处境相对来说要严峻得多，这也造成了此地文化人流动性较大的现象。

综观第五战区的文化工作，大至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这个时期是本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黄金时期，在几乎全由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担任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各项工作紧张热烈有序地进行着。

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中共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与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协商建立的，成立于1938年10月，主要成员胡绳、夏石农、孟宪章、李伯余、刘江陵、臧克家、张佐华、李相符、陈北鸥等几乎全是共产党员，主任委员是钱俊瑞，这样的统战组织在全国战区中是独一无二的。战区司令部移驻襄樊以后，“整个第五战区的文化工作，全在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领导和影响下，甚为活跃”(克家语)。活跃的抗战宣传活动，活跃的全民动员工作，活跃的统战工作，活跃的群众抗敌武装组织建设工作。据史料记载，仅襄阳一县，就有文化站十几个，鄂北数县发展战教团、民先、乡促会成员竟达万人之多；文化站领导发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宣传运动，其声势几可与抗战初期的大武汉媲美；1938年底老河口文化站召开“一二九纪念会”，次日组织“光河各界反间谍示威游行”，随即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光河锄奸团”。1939年初，汪精卫叛国，抗宣三队全队动员，半天一夜排出活报剧《打倒卖国贼汪精卫》，影响很大。据田涛回忆，那时，“穷乡僻壤都在唱，‘打倒汉奸，汉奸是心腹的大患，不肃清自己的阵线，怎救这当前的国难……’。”

然而，由于实际救亡工作的急需，进步文化人无暇从事精致的创作，他们大多参加了更实际的抗战启蒙宣传工作。如1938年底克家、雪垠、田涛、孙陵在均县“抗战工作讲习班”授课；风斯、白克等带着宣传队辗转于各处前线；胡绳等忙于主持《鄂北日报》；钱俊瑞等则周旋于战区上层人物之间做统战工作，为文工会下属的各项工作创造条件。可以说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没有写在纸上的”工作。

1938年11月11日战区政治部和文工会接管《鄂北日报》，钱俊瑞任主编，胡绳实际负责。共产党人掌握了战区的喉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更加如火如荼。

在极盛时期，鄂北聚集了相当多的已成名作家和青年作家，中华文协总会批准克家、雪垠等为文协等

备员。文友们也汇集了许多，姚雪垠、田涛、孙陵、彭澎、胡绳、陈北鸥、孟超、白克和北鸥，一时间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鄂北文协分会因而有“小中华文协”之称，一些颇有文名的作家也常常暂住此地，借鉴于此地的生活体验和所见所闻创作别有新意的作品，如谷斯范就是在此地调查了鄂豫皖边区“黄学会”的活动之后，将这些封建会道门的材料写进了他的著名的抗战通俗小说《新水浒》第九回“红枪会演出‘捉放曹’”。

陈北鸥在《文艺工作在五战区》一文中这样写道，“在第五战区里，我们不但看到文艺下乡了，并且是到了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了；文艺不但入伍了，并且是到了距离敌人仅几百米远的战壕里了，在五战区‘文人入伍文章下乡’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文艺工作者的实践。战区文艺工作者在努力建立着农村文艺，战壕文艺……”

五战区抗战文化工作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三个多月，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法》，五战区文工会被勒令解散，公开的共产党人被迫撤离，随即下属各群众团体停止活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文化活动遂告中止。

第二时期（1939年2月至1940年底），文工会虽然被解散了，但文化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由群众性转为职业性，大批进步文化人被地方当局用各种名义挽留了下来，如姚雪垠在五战区政治部挂了个设计委员的名，后来在司令长官部挂个秘书名，臧克家也是如此。田涛则身兼《珠江日报》特约记者与《阵中日报》副刊编辑两个职务，碧野于1940年初来到这里，也在战区政治部找了个栖身之所，挂中校衔。在襄阳、樊城、老河口军民俱乐部里，在政治部政工大队里，在抗演二队、演剧六队里，仍然主要由进步文化人主持。

由于这个时期是本战区作战最积极时期，战事紧张，情绪激昂，地方当局也需要有人做些宣传鼓动的工作，于是以桂系少壮派领袖、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为首的权力集团号召且欢迎作家们去战地采访，大批文化人兴奋地走上了前线，深入战地生活。风斯、黎嘉、孟超到枣阳主办前方文艺通讯员学习班，白克率襄樊各界慰劳团赴厉山劳军，谢冰莹率伤兵服务团来老河口参加基督教伤兵服务协会工作，所有进步文化人都卷进了战争的漩涡。

1939年4月，随枣前线气氛紧张，敌我双方箭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文协会组织了第一次“笔部队”开赴前方，克家、雪垠、孙陵各率一支小分队赴随枣前

线采访，姚雪垠去一四三师、孙陵去一八九师、克家去一七三师。他们“这一次并没有白跑，雪垠写了《春到前线》，《四月交响曲》，采集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材料……孙陵写了《突围令》和另外一些什么，我也用生命换来了《随枣行》和一心囊的诗料”（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第一次随枣战役后，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为迅速出版，扩大影响，7月，孟超、孙陵随韦永成去桂林筹备前线出版社，很快推出了第一批丛书：韦永成、白克《淮上三部曲》，姚雪垠《春到前线》（散文），克家《随枣行》（诗集），孙陵《战地书简》，梁纫夫《鄂北会战》（报告），孟超、白克《保卫五战区》（报告剧），北鸥《在五战区》（通讯），冰莹《十二个》（报告）。这些作品都是第一次随枣战役的收获，显而易见，都是直接反映前方战斗生活，而且直接服务于前线抗日将士的。这些作品出现在大后方文艺界关于“与抗战无关”论争之时，更具有独特的震撼作用。

1939年6月中华全国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以实际行动来推动进步文艺工作者与抗战现实的更加密切的结合。两个月后，在全国文协北线访问团的激励下，鄂北文协组织了第二次“笔部队”远征皖西。他们由襄樊而南阳；跨过平汉路，到漯河；经周口、界首抵阜阳；又渡淝水，北向涡阳、蒙城，一直走到大别山腹地——立煌。他们揭露汤恩伯集团在界首集走私资敌，发国难财；他们凭吊蒙城血战中的殉国将士；他们访问新四军办事处；他们与各地文艺青年倾心交谈，鼓励他们承担起救亡宣传的责任，“皖北各地的青年对我们这次访问都受到不少的影响，象《淮流》这样的刊物，都是在这时期酝酿成的。而全国和第五战区文艺运动的大体情况，也是在这时候传播到皖北去的”（姚雪垠《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

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是为了维系国际信誉，争取外援并抑阻汪伪政权建立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在初步整训后，投入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这是国民党八年抗战中采取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行动”（《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五战区首当其冲。为配合这次战役，推动宣传攻势，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指令《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更名为《笔部队》。“笔部队”队员有：韦永成、尹治、姚雪垠、克家、田涛、白克、安娥、谢冰莹等二十一人，阵容齐齐整整。为配合部队作战，文协分会组织了许多活动，第三次派出了“笔部队”，第一组姚雪垠、安娥等由京钟路转汉宜路。第二组克家等去信阳、确山附近。这一次笔征耗时三个多月，姚雪垠在给白克的信中写道，“每至一团即

分营召集官兵开生活座谈会以进行搜集材料工作，所以一师一师工作起来，真费时间也。此次来鄂中，所获材料，既特别丰富，亦深刻切实，生动有趣，只是没有工夫整理耳……”（《阵中日报》1940年1月21日）。在这次远征中，姚雪垠蕴酿成熟了他的著名抗战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第五战区“笔部队”活动意义重大，从全国战区来看，象这样有组织有规模地组织作家深入抗战前线的活动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它的发动和实施均早于中华全国文协组织的北地作家战区访问团；它涉及的地域不但是抗战的最前线，而且直至豫鄂皖敌后；所到之处，激励了当地文艺工作者，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作家们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与抗日将领张自忠、钟毅、黄樵松等交上了朋友，作品中更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战斗精神，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也更加广阔了。

“笔部队”对战区实际工作也有促进作用。第五战区作战部队是清一色的杂牌军，历来受国民党政府的歧视与排斥，虽然首当敌锋，但各项补给都不充足，张自忠部在冬季攻势中竟无寒衣御寒。姚雪垠的作品中就揭露了这个事实，1940年3月2日姚雪垠从前线归来，写了一组反映前方将士艰苦生活的战地故事，其中《人呢》《神兵》，真实地反映了前方将士的艰苦生活。他描写到，士兵都睡在稻草里，有时候甚至连盖稻草的幸运也没有。在进步作家的呼吁下，1940年9月，老河口发起“光河各界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运动”义演，各文艺演出团体纷纷编排出最拿手的节目，演剧四队献出《黑地狱》；政治大队推出《木兰从军》《英雄传》；朝鲜义勇队新排《皇军梦》；连日本反战同盟也编了一出《弃儿》，观众踊跃，气氛热烈。

配合反投降卖国的宣传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1940年为庆祝第一次妇女节，白克编了一个长达四万多字的独幕时事实录剧《汪精卫卖国协定》，集中全老河口的话剧、美工、音乐各界的佼佼者，邀请政治部正副主任为演出顾问，公演三日，极为轰动。

这个时期是五战区作家创作的爆发期；姚雪垠《春到前线》《四月交响曲》《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碧野《乌兰不浪的夜祭》《小鹰》《三次遗嘱》；克家的战地诗抄《随枣行》；孙陵《突围令》《战地书简》；田涛《子午线》《呜咽的汉江》《潮》；安娥《打回老家去吧》《“皇军”》《中国靠着他们》；黄丹的木刻《张自忠》，王寄舟的木刻《保卫大襄樊》等，均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国民党极右势力没有放过这些从事进步文化工

作的文化人，进步文化人走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就跟到哪里。姚雪垠1945年在一篇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中描写到这个事实，国民党特务不但监视积极抗日的将领，而且监视进步文化人，小说中的特务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知识青年，在进步文化人的感化下，终于吐露真情，翻然悔悟。

战区作家的作品高昂激情的乐观主义色调曾被大后方的某些评论家们指斥为“绛红色的色彩”；是“粉饰现实”，不是“真正战地生活”；抗战后期，当战区作家们被迫转移到大后方时，他们更受到了某些批评家的嘲笑，戏称他们为“从前线回来的”。然而我党和我党的舆论工具是了解艰难奋战在战地环境中的进步文化人的，《新华日报》社论这样评价说，“从大体上讲，一两年来我们的战地文化工作，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晋东南、襄樊、湘北、粤北、浙西、皖南等地，或者是在太行山、中条山、大别山等山脉中俱有很多文化工作者不辞劳苦和不避艰难地工作着”。社论还号召“我们在此号召一切从事文化的人能到战区去，负起加强文化宣传的工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和阴谋”（《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6日社论《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

第三个时期（1940年底至抗战胜利），1940年底大概是个特殊时期，两次随枣战役后第五战区再无大的战事，国共两党摩擦加剧，国民党年底通过的《共党处理办法》得有余暇借极右分子之手在战区施行，活跃的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臧克家（曾挂名长官部秘书）田涛（《阵中日报》副刊编辑）碧野（战区政治部秘书），不得不离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到池峰城的部队去寻找出路；姚雪垠其时卧病在床，被长官部借故免职，病稍愈便潜往大别山，去寻求另施才华的地方。他们联袂而去，栖身于台儿庄抗战英雄的军营里，想在那里真正干点事出来。其实基础还是有的，池峰城的秘书丁行就是共产党员，他手下的猛将黄樵松对进步文化人极为友善，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然而，没有过多久，反动分子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追究下来，“抗战英雄”畏缩了，他对克家说，上峰发现他那里有共产党，要杀他的头，克家们只得怅然而返了，以后他们辗转于安徽临泉，河南叶县等地，不久又被汤恩伯驱逐。可怜这些战区的文化人在炮火里跑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当作异己赶出了战地，真是有心报国，无路请缨。

郭沫若曾愤然写道：“散布在五战区的各种文化人组织，后来不久便先后被迫解散或转移，如象臧克

家、姚雪垠那样的人都不能呆下去了。那样的法西斯二头目能够指望他们重视文化吗？”

“法西斯二头目”指的是李宗仁，也许与实际有点出入。据历史资料所载，在整个抗战时期他对共产党和进步文化人的态度与蒋介石还是有区别的，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但即使是如此，他及他统率的军队的某些将领对文化人曾一度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也是无法否认的。有利时便利用，无利时便踢开，虽未斩尽杀绝，却也并不厚道。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克家、雪垠、田涛、碧野先后离开了鄂西北，第五战区文化工作的台柱子一下子塌了四根，留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处境更加艰难了，1941年4月，抗演四队，在鄂北战场奔波了两年的“火炬手”，在当地很有影响的艺术水准相当高的文艺团体被迫解散了，儿童工作队也被解散了，战区进步文化事业受到了空前的摧残。但是，团体虽然被解散了，人员却没有走，他们以更加曲折韧性的战斗精神继续宣传着抗日救亡的真理，他们有的主持“军民俱乐部”，有的转到政治大队的演出单位，坚持不懈地继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步文化活动：

1941年7月7日，“军民俱乐部”举办了《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展出了以沈逸千为首的北路战地写生队的作品；同年10月10日，战区政治部与战地写生队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筹集资金联合举办了美术作品展销会；政治大队仍坚持演出进步剧目，如《国家至上》《魔窟》《人约黄昏》《大风》《月夜》《清风寒》《上海之夜》等；

1941年7月1日张维（张兆麟）、丁冬、王寄舟、蔡方、翁村等二十二人发起组织第五战区文艺家协会，力图打破战区内沉闷的空气，重振第五战区进步文化事业的雄风。他们在宣言中写道，“鄂北是一个艺术处女地，但他在抗战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为着打击敌人协助抗战，艺术战线需要展开。……我们希望大战区一切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都能够在这个艺术协体内团结起来，群策群力，从事拓荒工作。”1941年秋《战地》月刊创刊，五战区政治部主办，秘密共产党员张维担任了主编。

《阵中日报》的副刊仍不断发表进步文化人的稿件，克家、雪垠、田涛、碧野们依然关心着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无论他们转战到什么地方，依然来信来稿，传递着进步文化工作的讯息。

在抗战中期国统区政治最黑暗的年代里，进步文化人坚持着用各种方式宣传着抗战救亡的真理，打破

愚昧的文化封锁政策，痛击投降反共逆流，让真理的声音传进来。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悍然入侵苏联，国民党极右分子幸灾乐祸，鼓噪着共产主义将面临毁灭。姚雪垠此时正在大别山中，他创作了著名的抗战论文《希特拉的最后一张牌》，文中大义凛然地宣告，“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绝对对立的……苏联的危机即人类文明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被侵略者，都变成苏联的同情者和知己朋友，不可避免的要共患难，同生死”，断言这是希特勒的最后挣扎，苏联必然获得最后胜利。《阵中日报》编者从别处辗转得到稿件后，于7月27日在《阵中日报》《星期文粹》版上全文发表，读者阅后无不称快。当年12月，日本侵略者偷袭珍珠港，气焰十分嚣张，《阵中日报》编辑又特约姚雪垠译出澳大利亚端纳作《中国不会败》的长篇文章，在报纸首要位置连载五天，引起了轰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通过广大进步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五战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坚持了下来，不但没有同流合污，而且从污浊的局面中放出了光辉。

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区进步文化工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翼，在特殊的环境里通过复杂曲折的斗争，不屈不挠地谱写了一曲壮歌，它深沉执着地萦绕在历史的主潮中，不因抵毁而稍减光辉。

今天，我想，许多今日尚健在原战区进步文艺工作者，包括目前居住在台湾及海外的战区作家们（在五战区工作过的老作家如钟香草，尹雪曼，谢冰莹，孙陵等）可以自豪地如姚雪垠当年一样回顾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已经含冤辞世的原战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们（包括那些曾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的“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等文艺演出团体的成员），应该可以含笑瞑目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纪念鄂北第五战区的进步文化活动。

主要参考资料：

- 郭沫若《洪波曲》
- 钱俊瑞《回忆第五战区工作委员会》
- 李相符《抗敌工作委员会》
- 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
- 姚雪垠《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
- 孟超《文艺工作者在鄂北》
- 孙陵《我所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 田涛《疆场战歌》
- 碧野《跋涉者的脚印》
- 白克《活跃着的鄂北工作》